

共存与互嵌：河湟区域社会各民族的生计模式

董玫

兰州文理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甘肃省兰州市 730000

摘要：河湟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边界，黄河、湟水和大通河交汇的河谷地带。这里河流与山脉互嵌，民族众多，造成生计模式的多样性。本文聚焦河湟生计模，探索各民族生计模式在各族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互惠互补关系；及其对该地区民族共融的族群关系的影响力所在。

关键词：河湟地区；生计模式；族群关系

古代河湟社会的生计模式呈现出一种持续稳定的缓慢发展，几乎无质的变化；清末民初，兴起的城市催生大量新型生计模式，如现代商业、社会服务业以及粗放式工业等，成为支撑河湟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同时，传统的游牧和农耕型生计方式依然重要，是河湟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底色和特色。

河湟社会中的藏族和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为辅；以经商著称的回族散居在整个区域；汉族多事农业，集中在川水地带以及城镇，在浅山区也有分布；土族^[10]主要集中分布在湟水和大通河之间的河湟东北部地区，以农耕为主；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以手工技艺见长。

一、自然环境对农牧分布的影响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生计方式高度依赖自然环境。河湟地区恰好符合“垂直气候特征适宜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空间。活动在河谷地带的民族偏重农业，手工业，高山民族偏重牧业；加之这地带正位于‘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1]上，……成为民族迁徙的必经之地”的条件^[12]。这里平均海拔2000–2500米之间，属于高原浅山丘陵地貌，既有适宜放牧的高山草甸草原，又有谷地河道为农牧业提供水源；这些令多种经济模式互补兼容成为现实。

农业是河湟生产方式的底色，是各族农耕者基于自然条件的自觉选择。适宜农耕的海拔和温度以及纵横阡陌的河流保障农业生产。河湟谷地又不同于其它大型冲击平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两大板块的对冲令地貌呈现出多样性：以积石山为例，其河谷海拔约1800米，是重要的旱作农业地区；大小积石东麓西麓海拔2300–2600米之间的高山草甸是优质天然牧场；最高峰达里加峰则达到海拔4636米，降水丰沛，森林覆盖率90%，以林业为主。这种垂直地貌为农牧互嵌提供了自然条件。川水区海拔在2000米左右，适合精耕细作；山脚下的浅山区和脑山区海拔约2500–3000米，耕地依赖降水，农业开发程度浅，适宜以畜牧为主，兼耕种。

畜牧业是河湟生产方式的特色，是游牧族群的传统生计模

式。河湟谷地的西北边缘——日月山是河湟谷地与青海湖区的分界线，也是河湟牧业和农业的分水岭。海拔4000米的日月山阻隔温暖的太平洋季风，山麓东侧阡陌纵横，是大片的良田；西侧是无际的草原牧场，牛羊点缀其间，一派塞外风光。西汉末年，王莽曾在此设西海郡，强迫中原数万移民在此开发耕地，以期“四海统一”。然而，寒冷恶劣的高原气候不宜耕作，新朝瓦解时，西海郡被羌人夺回，恢复游牧生计。至今青海湖以西仍是重要的牧区。

二、古代河湟农业与牧业的变迁过程

《后汉书·西羌传》中写西羌部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可知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为生是早期先民的生计方式。两汉，羌汉之战改变了游牧部落的分布格局，赵充国“屯田召降”的治边之策将中央权力扩大到河西走廊。这里的耕地的面积迅速扩张至青海湖区域，迫使此地游牧的羌人西徙。除了屯垦的汉人，在汉族杂居的陇南、天水、陕西南部和四川松潘一带，西戎部落的一支——氐人因“俗能织布，善种田”，且“熟知中国语”，^[13]逐渐壮大。晋太元5年（380年），氐人苻坚徙3000户进入河湟地区，至枹罕，史称“枹罕诸氏”。他们逐渐融入当地羌人和鲜卑人中，推广耕作，遂繁盛。

古代河湟政权还平汉国、前赵国、前秦、后凉、吐谷浑、唃厮啰等。他们大都通过战争方式来掠夺土地、人口和财富，之后沿袭农牧兼蓄的生产模式。本质上，战争互动是一次次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游牧势力的较量，“一般而言，当中原王朝国势强盛时，农牧边缘地带处在中原王朝控制之下，随之内地大批汉人迁往屯垦戍边。这里被农耕文明所淹没；当中原王朝国事衰退时，周边游牧民族往往趁虚而入夺取这些土地”^[14]，农业生产随之遭受相当程度的破坏。因此说，伴随着政治势力博弈的是农耕与游牧生计的一次次拉锯战。随着汉族屯垦移民不断迁入河湟社会，其结果就是适合农耕的土地不断扩大，河谷地带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抚循军民”，于是“河州遂为乐土”。^[15]

但是，河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并没有使得游牧经济

衰退，迄今，这里的畜牧业发达程度不亚于农业，“人们普遍认为农业文明发达地带处于中心位置，而游牧文化却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只能在边缘地带发展。事实上，青藏高原同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如此，青藏高原还孕育了多元的游牧、宗教、艺术等”^[16]。河湟独特的文化以及相互依存的生计是农耕和游牧文化撞击、叠加、融合的产物，也是多族群共同长期生活的结果。

三、近代以来工商业的繁荣

早在唃厮啰时期（997—1056），河湟一带的丝绸之路南道（吐谷浑路）畅通无阻，西域商人往来于汴京与西域诸国之间，邈川、临谷、青唐等地设互市，西域的财富经过河湟源源不断输入中原，河湟社会持续繁盛。吐蕃每年为宋朝输送近数万良马，商业同时还带动了农牧业的发展。元明时期，“元人控驭西番，恒以西平为要地，明初，置卫屯兵，兼设茶马司于此，用以驭制番戎云。”^[17]清末，左宗棠在整个平定战乱的过程中，目睹西北之落后，民生之凋敝。他认为“穷极生变”是陕甘之乱的根本原因，着重发展近代教育和工业。因此，河湟社会发生了巨变，其近代生计模式也逐渐衍生出商业、社会服务业和采掘业等。

（一）善于经商的河湟回族

河湟的地理优势是商贸发展的重要条件——汉藏交界令“买茶易马，固为一事”，马匹和茶业是中原边防与游牧饮食的刚需，贸易络绎不绝。北宋时期，丝绸之路被西夏隔断，河湟南道变成主干道，河湟一带产生诸多贸易中心，如丹噶尔古城，就是当时唐蕃古道和丝绸南路的交汇点，见证了农耕与游牧的交流。元代重视商业，许多穆斯林“斡脱”^[18]商队的足迹遍布全国，其中的大多数是河湟一带的回族。明洪武年间，秦州开设茶司，随后在“秦、洮、河、雅诸州”设茶马司。清代以来，以河州和西宁为中心，临潭、拉卜楞、塔尔寺、贵德、湟源等地已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

除茶马交易，河湟牧区的皮毛在近代也成为外销的主要产品。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在兰州创建织呢总局，一时间河湟羊毛供不应求。更有甚者，来自英、德等国德洋商专程来到循化、同仁等地设专号采购羊毛：“若洋商、皮商，更协巨资，开设羊毛行。县内设有羊毛行十五六处。资本少者万金，多者十余万，专购皮马毛，辇归制造。”^[19]这些洋号大多雇用当地回族商人，近代河湟皮毛生意盛极一时，成为回族的主要生计模式。此外，大片原始森林富含珍贵的药材，河湟鹿茸、麝香、虫草、当归、大黄、甘草等在内地需求量大；内地产的布匹、绸缎、陶瓷等又是藏区的生活必需品，这种供需关系中蕴含巨大的商机，另外，牧区粮食匮乏，“宁郡不产粳粟，米皆贩自他邑”^[20]，回族商人往来奔忙于内地牧区的同时获得巨额利润。

回族经商方式一般有两种，固定开设商铺、摊点、旅店的叫坐商；运送货物流动售卖谓之行商。行商的“回商人藏区者……

以牛驮货，携带、帐篷、炒面、米粮，使用器具及自卫枪等，路上同行，至交易点后，则各投藏民‘主人家’（部落首领），由‘主人家’介绍，或直接与藏民进行交易，交易或通用货币，或物物交换”^[21]。坐商多集中在人口集聚的寺院、卫堡、渡口，这些地方逐渐形成集镇，为农牧交易提供服务，集镇中有固定的坐商，也有赶集的行商。《甘肃通志稿·建置志》中记载，民国时期河州集镇17处，西宁4处，循化2处，有些集镇“有肆无集”。据《大通县志》记载，大通城南的新城贸易繁荣，有商铺300户以上，还设有典当行。^[22]

（二）从事手工业的东乡族和保安族

元代从中亚到此地的工匠是东乡族和保安族最早的先民，他们将祖先高超的手工技艺带到河湟，以此谋生，将之发扬光大。

今天东乡县有许多东乡语地名与生计有关，“勉古赤”意为银匠、“阿类赤”（编织匠）、“托木赤”（铁匠）、“依哈赤”（钉碗匠）、“陶毛赤”（制革匠）等，如实记录了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水流湍急的黄河上，有一种专门从事运的人群被称为“筏子客”，他们大都是些贫苦勇敢乐观的东乡族人。清代，康熙朝河州知州王全臣有诗云：“回车渡黄河，河干日已昃。……高下任狂波，惊悸为失色。涉险思履危，使我中心恻。”

保安族除务农、经商外，擅长冶铁。保安腰刀精美耐用，深受藏族、蒙古族牧民的喜爱。从元代起，保安族就以冶铁打刀著称。伊朗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写道：“蒙古人结束花刺子模的战斗，掳掠驱奴，进行抢劫屠杀，血腥镇压，再把居民中的工匠瓜分，送到东方诸国。”保安族人把自己祖先精湛的铸造技艺适用于当地需求，突破创新，在清末民初逐渐完善成型保安腰刀制作工艺，实用性和审美性兼备，比较有名的样式有“什样锦”、“双落”、“扁鞘”“蒙古刀”“哈萨克刀”等等。近代保安人的冶铁业往往是用来补贴农业收入不足的第二产业，也有部分保安族工艺匠人专事冶铁。1958年的社会调查中，居住在保安三庄甘河滩村的一户铁匠家“家庭生活99%依靠打刀。”^[24]保安人在从事几百年的“果尔”（工匠）生产活动中，一方面继承完善先祖谋生的技艺，是保安族男子独特的生计方式；另一方面将穆斯林文化和审美情趣与周边民族的需求结合起来，创造出本民族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5]。

结语

通过民族分布、生态环境、生计关系等诸多方面的考察，我们切实感受到河湟传统生计模式体现出一种互补、协作、分配的结群关系。这种关系在区域经济方面体现在各族群利益最大化，同时确保族群生产生活延续；在文化方面既保留传承祖先记忆，又在吸纳其他族群文化基础上发展本族文化；在族际关系方面，保持与他族清晰的边界，内部成员亲密互助。但是，河湟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多民族共生的人文特点决定了“小结群”关系必然在

“大结群”关系中以弥散和嵌入的方式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民族共同体自在到自觉的典型范例。

本文系教改项目《文化自信背景下中国传统音乐在高校声乐教学中践行“美育浸润行动”实施路径》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4-ZL-jxgg-19。

参考文献：

[1]《大通县志·建制市镇》，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民国8年铅印本影印。

[2]（清）王全臣撰修：《河州志校注》（卷6），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3]《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33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版，1990年。

[4]（清）乾隆《西宁府新志》（卷9），《街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6），陕西（十四）。

[6]（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元遗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7]陈寿：《三国志·魏书》，（卷30），《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8]李何春，李亚锋：《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

[9]马建春：《多元视域中的河湟：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地缘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10]明代初期，西宁周边迁来的蒙古族经过几百年的演化，受到周边族群的影响，在1949年民族认定中，互助地区的被认定为土族，大通一带自主选择为蒙古族、土族，湟中一带选择为藏族。

[11]林耀华提出“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概念。他认为：“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到准噶尔盆地的西缘，南到横断山脉中段（云南中部）的广大地区内，基本上构成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

畜牧带。”（林耀华：《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12]李何春，李亚锋：《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13]陈寿：《三国志·魏书》，（卷30），《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4]秦永章：《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5]（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元遗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6]尕藏才目、格桑本：《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6），陕西十四。

[18]由官方提供资金，专门为贵族官要提供服务的商人。

[19]（民国）《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33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版，1990年，第88页。

[20]（清）乾隆《西宁府新志》（卷9），《街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1]马建春：《多元视域中的河湟：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地缘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8页。

[22]（民国）《大通县志·建制市镇》，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民国8年铅印本影印，第133页。

[23]（清）王全臣撰修：《河州志校注》（卷6），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314页。

[24]《裕固族保安族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25]2006年，保安腰刀锻造工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